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


霍旭初 赵莉 彭杰 苗利辉◎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

霍旭初 赵莉 彭杰 苗利辉◎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霍旭初,赵莉等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9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8821-5

I.①龟… II.①霍… III.①龟兹—石窟—佛教史—研究 IV.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8202号

出版统筹 // 若 贤

责任编辑 // 若 贤

书籍设计 // 李晓瑜

技术编辑 // 杨 爽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6开

印 张 34.75印张

字 数 78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09.00元

前 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题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一部分专家、学者对新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提供参考,同时提高人们对新疆历史的整体认识和研究水平。

近代以来,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陆续发现了大批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历史的内涵,新疆历史研究因此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一百多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新疆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新疆通史》的立项,再一次为新疆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希望,通过编撰《新疆通史》,能够出版一批包括《新疆通史》主体工程在内的学术精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历史搭建一个新的平台,造就一批政治上强、业务素质高、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各民族专家、学者。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配合《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对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经过认真审核和甄选,我们现将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研究丛书公开出版,以供大家参考。

鉴于我们的水平,所选著作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导 论 / 001

第二章 龟兹石窟举要 / 010

第一节 龟兹石窟地理分布与年代概述 / 010

第二节 龟兹石窟的形制与功能 / 045

第三章 龟兹石窟佛教思想基础与框架 / 050

第一节 毗昙学概述 / 050

第二节 龟兹是毗昙学思想的重要覆盖区 / 054

第三节 毗昙学是龟兹佛教的主要理论基础 / 056

第四节 用毗昙学考察与解读龟兹石窟内容 / 057

第四章 龟兹石窟的原始佛教思想 / 064

第一节 四谛 / 064

第二节 八正道 / 069

第三节 生死轮回 / 074

第四节 戒、定、慧 / 076

第五节 龟兹石窟原始佛教宇宙观 / 094

第五章 龟兹石窟的因果观 / 122

第一节 因果法则的一般原理 / 122

第二节 说一切有部因果观 / 124

- 第三节 释迦牟尼佛的“十宿缘” / 126
- 第四节 龟兹石窟“因果报”图像 / 137
- 第六章 龟兹石窟的菩萨观 / 142**
- 第一节 说一切有部的菩萨观 / 142
- 第二节 “轮回时代的菩萨” / 144
- 第三节 “最后身菩萨” / 184
- 第四节 关于弥勒菩萨 / 215
- 第七章 龟兹石窟的佛陀观 / 219**
- 第一节 原始佛教佛陀观 / 219
- 第二节 部派佛教佛陀观 / 221
- 第三节 龟兹石窟中的“过去佛” / 234
- 第四节 龟兹石窟中的释迦牟尼佛教化事迹 / 257
- 第五节 龟兹石窟释迦牟尼佛“神通”与“神变” / 326
- 第八章 龟兹石窟的解脱观 / 334**
- 第一节 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解脱观 / 334
- 第二节 说一切有部的两种涅槃 / 335
- 第三节 龟兹石窟涅槃题材图像 / 339
- 第九章 经量部对龟兹石窟的影响 / 369**
- 第一节 经量部思想的东传 / 369
- 第二节 克孜尔石窟出土《喻鬘论》考证 / 371
- 第三节 龟兹石窟《喻鬘论》图像 / 374
- 第四节 《俱舍论》思想在龟兹石窟中的反映 / 382
- 第五节 “譬喻”与佛教艺术的勃兴 / 384
- 第十章 大乘佛教在龟兹初传及其消长 / 391**
- 第一节 鸠摩罗什前龟兹大乘佛教的情况 / 391
- 第二节 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及其影响 / 393
- 第三节 龟兹王族对大乘佛教的扶植 / 397
- 第四节 鸠摩罗什大乘思想与龟兹大像窟 / 399
- 第十一章 龟兹石窟的中原大乘佛教 / 407**
- 第一节 中原大乘佛教的西延 / 407
- 第二节 龟兹地区的汉风洞窟 / 408

第三节	净土信仰统摄龟兹汉民	/ 413
第四节	回鹘佛教在龟兹	/ 423
第五节	龟兹石窟中的密教	/ 426
第十二章	龟兹佛教及石窟的历史学考察	/ 437
第一节	迦腻色迦佛教结集与佛教东传	/ 437
第二节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与路线	/ 439
第三节	龟兹白氏王族统治与龟兹佛教的发展	/ 443
第四节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与龟兹佛教的繁荣	/ 447
第五节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与龟兹佛教	/ 456
第六节	龟兹本地高僧与游历龟兹的高僧	/ 463
第七节	龟兹佛僧“帛”姓问题	/ 470
第八节	龟兹石窟中说一切有部僧衣特征	/ 479
第九节	龟兹石窟中的古文字	/ 490
第十三章	龟兹石窟与本土文化及其对外影响	/ 495
第一节	龟兹本土文化概念	/ 495
第二节	龟兹本土文化对龟兹石窟的影响	/ 497
第三节	龟兹佛教思想对龟兹世俗文化的影响	/ 508
第四节	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及其对外影响	/ 513
第十四章	龟兹佛教与石窟的历史价值与研究展望	/ 521
第一节	龟兹佛教与石窟的历史价值	/ 521
第二节	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展望	/ 532
参考文献		/ 541
后 记		/ 548

第一章 导 论

龟兹石窟是世界性的佛教文化遗产,其遗存的数量和规模堪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中国敦煌莫高窟媲美,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型佛教石窟群之一。重要的是,龟兹石窟所蕴含的佛教思想、艺术形态等代表了佛教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在佛教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龟兹石窟在公元9~11世纪古代新疆社会大动荡、文化大转型中,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它的辉煌与价值在历史风云中逐渐消失、遗忘,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公元18~19世纪,中国清朝文人首先重新发现了龟兹石窟。随后在西方中亚探险考察热潮中,龟兹石窟遗产被逐步展现于世,震动了世界学术界,成为20世纪新兴的学术焦点之一。龟兹石窟研究的开展,为“龟兹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龟兹石窟的佛教思想、派属和产生、发展、兴衰、消亡的历史以及对东方佛教影响等研究,是中国以至世界佛教文化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命题。

龟兹是中国古代西域最大的城邦国之一。龟兹一词最早出现在班固《汉书》中:“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还有丘慈、丘兹、屈茨、屈支之别称)龟兹之名在史籍中延续至元代。根据考古发现,龟兹文明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其文化絮脉也可延续至今。但从构成龟兹文化概念的时空范畴看,主要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显著文化形态及其在世界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公认的龟兹历史时空概念,是从汉代至元代。龟兹的空间概念是以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为中心,东及轮台,西涉阿克苏、温宿、阿瓦提、柯坪、巴楚一带。

龟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北依横贯新疆的天山,南临中国最大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天山流出的两条大河——渭干河(古称西川水)和库车河(古称东川水)以丰沛的水源,滋润着龟兹大地,养育各族人民劳动生息。龟兹的东西两面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平坦而广袤的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亚洲连接西方的通道。这里是古代民族的生活、迁徙、征战的舞台。古代龟兹人种混杂,民族多元,既有西方的欧罗巴人种,也有东方的蒙古人种。龟兹历史上,除了土著民族外,还有羌、汉、塞克、月氏、乌孙、匈奴、粟特、突厥、回鹘等民族生活于龟兹地区。龟兹和周边地区史前时期墓葬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兹的居民已经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创造了龟兹文化的初级形态。

汉代,龟兹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原与西域错综复杂的交涉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龟兹已是西域诸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城邦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一系列战争,取得三次重大胜利。汉朝控制西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了有效的统治。汉朝在西域实行屯田制度,这是体现中央权威和巩固统治的重要策略。汉朝建立了以轮台为中心的屯田基地。以后将屯田扩大到焉耆、龟兹等地。龟兹土地肥沃、面积大、人口多,龟兹屯田的开辟,为汉朝统治西域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公元前60年,汉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于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入汉朝版图之内,从此,西域与中原紧密连接在一起,尽管后来西域局势动荡起伏,但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是历史定案。

龟兹历来是西域执牛耳的最大绿洲城邦国。汉代西域都护府建立后,龟兹在西域的重要地位开始显现。东汉时,征战西域的班超,深知龟兹在西域的重要地位,他在上奏汉朝廷疏状中说“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①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与中原政治交往不断,文化交流频繁。吕光西征与东归揭开龟兹文化大规模东传的序幕。到了唐代,大一统的中国,经营西域的领导机构,再次选在龟兹。公元658年,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治龟兹,并升为安西大都护府。成为管辖广袤西域与中亚的政治中心。中国汉唐盛世的西域统治中心两度设置在龟兹,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无可置疑。

龟兹经济也居西域前列,农牧业发达,矿业、手工业领先于西域各地。龟兹生产的铁可“恒充三十六国用”。“汉龟一体钱”的铸造流通,显示了龟兹地域性的重要经济地位。汉唐之际,龟兹都城规模巨大,史载“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龟兹经济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

龟兹历史发展虽然起伏跌宕,兼并剧烈,但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即汉唐之间龟兹本土的统治权长期由白氏政权执掌。反映出龟兹主体民族是一贯传承的。这是社会大局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龟兹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龟兹石窟图像中,龟兹国王和王族显贵供养人形象之同一、时代之持久、地位之鲜明,完全印证了这个历史事实。

龟兹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东西方交通的中枢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达的经济文化,世界文明的注入,造就了龟兹地缘、人文的优势。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②龟兹是四大文明的重要交汇点之一。龟兹文化最鲜明的印记就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融。文明的交融,在一定的时代,宗教是最先行的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意识形态。龟兹地区的这种优异的条件,培植了佛教传播、生存、发展的土壤。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观察人生中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现象,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于是萌发了要出家修行的念头。希望通过出家修

^①《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2页。

^②季羨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行,寻找解脱苦难的道路。经过种种艰难的磨炼,终于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从而成为获得无上大觉的佛陀。

佛陀汉译简化为佛。佛的意思是“觉悟者”,即觉悟了人生真谛的意思。佛教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等学说,都是按照上述教义展开的。不论后来佛教发展成多少部,多少派,都是在最基础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升华或新创、衍化的。不论后来的“大乘”“小乘”分歧多大,其哲学基础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佛教大体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四个发展阶段。原始佛教大约为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至逝世后一百年间,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是:亲自聆听过释迦牟尼的佛弟子,依照“遗教”精神,在佛教修行、教义解释、教团生活方面遵循释迦牟尼在世时的惯例行事。佛教史上称为“和合一味”时期。佛灭度约一百年后,统一的佛教开始分裂,出现不同的派别。此时期称为“部派佛教”时期。最初产生的是两大部派,即大众部和上座部。所谓上座部是因为这一派代表人物大多是上座的长老。教义上严格遵守原始佛教教义和仪轨戒律。大众部是由于举行结集时,人数特别多,通常称之为大众部结集。大众部更动了上座部结集的经、律、论三藏内容,修改了戒律,重新制定了一些经典。大众部与上座部学说上歧义很大。此后两大派各自发展,最多时分裂出十八部或二十部。部派佛教时期各派都有自己的三藏。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内部出现新学说、新思潮,这些派别自称他们能“普度众生”,就像一艘巨大的船,能承载无量众生到达解脱的彼岸,故自称“大乘”,而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严格讲将佛教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思想理论,冠以大小之称是不科学的。大乘佛教是在“小乘佛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继承了大量“小乘”思想。密教是佛教发展的最后阶段。大约公元7世纪起,印度佛教开始衰落,为了维持佛教存在,开始吸收民间流传的印度教的某些思想和形式,形成了密教。密教实际上是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体。佛教的密教阶段,标志着佛教从兴盛走向了衰微。

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约始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扶植佛教,并提倡与支持佛教向印度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佛教开始越出了恒河流域。一般来说,由印度北部经西域到中国内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区传入的佛教,称为“北传佛教”。后期传入中国西藏、内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的佛教,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由印度中部经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傣族地区传入的称为“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巨大发展,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大乘佛教进入发展的最高峰,标志着佛教的黄金时期。

“北传佛教”越过葱岭(帕米尔)首及中国西域。之后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的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传播,形成了几个佛教中心地,昆仑山北麓的于阗和天山南麓的龟兹、高昌是西域著名的佛教大国,也是中国佛教的策源地之一。天山南麓的龟兹更是对中国佛教思想、艺术的发展有特殊的影响和贡献。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是学术界长期探索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近年的研究逐步取得接近历史真实的进展。有一种对此问题探索的新视角,有一定的可信性和启示性。这种观点认为:佛教从北传路线东渐之始,西域诸地绿洲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西域只能是佛教路过的通道。因为佛教是个依靠供养的“寄生”宗教。它的生存需要三个条件即:接触传播、供养人和城市背景。当时西域诸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公元后的东汉时期,在中央政权有效的管辖下,西域地区施行屯田制度,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水利技术,西域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龟兹经济因此而突飞猛进,人口迅速增加,商业兴起,文明进步、城市形成,佛教的生存发展条件逐步具备,佛教开始在龟兹“落地生根”。公元3、4世纪,龟兹佛教已经兴盛起来,佛教文献已有龟兹佛教的许多记载。同时,龟兹石窟开始兴建,首先开凿的是克孜尔石窟。以后龟兹石窟陆续扩展,5、6世纪是龟兹石窟的发展期,至7、8世纪龟兹石窟达到鼎盛时期。从现在遗存看,龟兹石窟有10余处石窟群,总计洞窟700余个。克孜尔石窟为最大的一处,是龟兹石窟的标志性洞窟群。

从文献与文物看,龟兹佛教一开始就属于部派佛教思想体系,同时也有大乘思想传入。部派佛教的根据地是印度北方的罽宾和犍陀罗地区,这些地区与龟兹既地域相近,又有人种、文化的密切关联。早期至中原传法译经的僧人,有一大批是罽宾、月支人。上述地方僧人到龟兹传法的很多,龟兹僧人也常至这些地方学习佛法。龟兹接受印度北方流行的部派佛教思想是行之必然的。龟兹主要接受的是部派佛教中势力最强、理论最丰富的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有部是龟兹佛教的主体派属。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的佛教启蒙思想就源于有部。后来他接受大乘思想,并矢志不渝为大乘“般若学”献身,得到龟兹王室的支持,大乘佛教在龟兹有强势的发展。但随鸠摩罗什东去后,有部重新占据龟兹佛教的统领地位,而且一直延续不衰。印度有部的新思想也在龟兹得到传播,龟兹成为有部的东方重要基地。

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基础是“三世实有”和“法体恒存”。它的理论实践是重视开展“阿毗达磨”对佛理的论究。阿毗达磨早期译为毗昙,研究阿毗达磨理论的学术被称为“毗昙学”。“毗昙学”曾是部派佛教时期势力强劲的学术思潮,对佛教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弘传时期,毗昙学与般若学、涅槃学称为中国佛教三大思想体系,对中国佛教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龟兹佛教崇奉说一切有部,在佛教文献中早有记载,《出三藏记集》“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都有所透露。《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都有明确记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具体记载龟兹佛教尊奉《阿毗达磨杂心论》《俱舍论》和《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三部论书。它们是“毗昙学”的骨干论书和理论发展的代表作。从3世纪开始兴起的龟兹石窟,至唐代末期,“毗昙学”思想理念贯穿于石窟艺术造像中,形象地印证了龟兹佛教一贯的思想理论体系。龟兹石窟既是龟兹佛教艺术的结晶,更是龟兹佛教思想的宝库。龟兹石窟是龟兹佛教的意识形态。石窟的建筑、雕塑、图像无一不是这个属性。这个基本点必须把握准确,否则某些背离佛教教义、任意歪曲图像内容的谬说,就会干扰龟兹石窟研究的健康发展。

龟兹石窟的探索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经过中外学者不懈的努力,取得巨大的研究成果。龟兹石窟研究主要在考古、艺术层面上取得的成果比较显著。但是,龟兹石窟研究的一些根本性的命题,即它的佛教思想理念和理论特征,也就是它的“表法”功能和内容,还远没有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来,还存在对佛教美术与佛教义学关系认识上的模糊问题。我们还是要强调与遵循赵朴初先生的论断:“佛教美术是和佛教的教义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的。佛像都是表法的,佛教教义

的谛,就体现在佛教艺术。”^①根本性问题不取得突破进展,一些艺术、考古层面的研究都不会是很准确、深刻的。从中国佛教史研究倾向看,包括龟兹佛教在内的西域佛教,逐渐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

一、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中,中原传统文化的融入和影响,加上大乘思想走向丰富与成熟,部派佛教特别是有部的理论受到冲击,否定与破斥部派佛教的思潮逐步发展膨胀。后来逐渐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到了隋唐时期,大乘成为中国佛教的统摄思想。信奉小乘的人被视为“钝根”者,“耻小慕大”思潮膨胀,从此小乘佛教在中国长期处于被压制、贬斥的地位。必须指出:所谓的“大乘”和“小乘”的称谓,是极不准确、不妥当的。但由于长期的流传,已成习惯,而且这种称谓在历史发展变化中,已经逐渐淡化了褒贬的含义。但我们仍认为,应该采纳南传佛教的称谓,准确地称为“大众部佛教”与“上座部佛教”。由于大小乘的说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我们仍沿袭使用,但观念与内涵上,有质的不同。

二、古代西域地处中国的边陲,属于“异域文化”的地区。由于中国重中原,轻边陲观念比较根深蒂固,加上前述的重大乘,轻小乘的观念,使龟兹佛教研究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还有一些学者用大乘佛教观点审视龟兹佛教。他们用龟兹僧人在中原翻译大乘经典就反推龟兹也流行这些大乘经典,这种所谓“逆向”研究方法,使得龟兹佛教研究处于视野狭窄、思路陈旧、拘泥前说、甚至“本末颠倒”的状况,

三、近代龟兹石窟研究,以18~19世纪西方对中亚、西域探险考察为发端。在采取掠夺手段将龟兹石窟文物劫往欧洲后,经过西方学者的科学研究,龟兹石窟的某些价值与内涵,被揭示出来。为龟兹石窟的研究开了先河,打下一定的基础。在客观评价西方的成就与贡献之余,必须指出他们劫掠文物的非法性和造成的负面历史后果。在研究方面他们的主导思想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研究成果偏重在艺术风格和年代断定方面。对龟兹石窟的佛教思想内涵,涉猎很少或认识有误。这与他们探险与考察的出发点和目的以及考察队成员的职业素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说,西方研究龟兹石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们的研究,不是全方位地进行,特别是佛教义学研究的欠缺,使龟兹石窟研究一开始就有“先天不足”之虞。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奋起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对龟兹佛教属性问题认识不统一、不深刻,因而在佛学思想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成果比较少。

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好两个定位问题。即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龟兹佛教的历史定位应该是:

龟兹佛教以原始佛教思想为基础,主要是在佛教历史发展阶段的“部派佛教”时期内。印度的“部派佛教”时期相当长,虽然佛教历史分四大阶段,但其时代是交叉的。在印度,“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交错并存时期长达4个多世纪。公元7世纪初唐代高僧玄奘和义净赴印度求法,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记录了当时印度大小乘并存的情况,而且小乘还占优势。龟兹受印度深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龟兹石窟的产生、发展、繁盛。衰落的时代大背景,都是在“部派佛教”时

^① 赵朴初:《佛教画藏系列丛书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期范畴内。

龟兹佛教的理论定位应该是：在原始佛教思想基础上，部派佛教的“毗昙学”是研究龟兹佛教的主要理论取向。“毗昙学”的理论十分丰富，典籍已成体系。有部的基本论典是《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达磨集门足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阿毗达磨施設足论》《阿毗达磨识身足论》《阿毗达磨界身足论》《阿毗达磨品类足论》。随佛教的发展，说一切有部也在不断变化，部派佛教最后一个部派——经量部，从有部中分裂出来。经量部批判有部的“三世实有”论，提出新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世亲的《俱舍论》。该论发展了有部的理论，是“毗昙学”的总结性文献。《俱舍论》的思辨性、组织性，达到理论的高峰，被誉为“聪明论”。《俱舍论》为有部所接受，标志“经量部”理论对有部思想改造的成功。“经量部”与说一切有部重视“论典”（阿毗达磨）不同，此派重视“经书”的论究。视“经典”为正量，故称为经量部。经量部的开创者是鸠摩罗多，汉译童受或童寿，有“日出论师”之美誉。与马鸣、龙树、提婆并号“四日照世”。童受著有《喻鬘论》、《痴鬘论》和《显了论》。童受在讲经时，善于用“譬喻”方式解说经典，被称为“譬喻师”。故经量部又称“譬喻部”。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署名童受的《喻鬘论》残片。《大唐西域记》载，佛教东传越过葱岭（帕米尔）的第一站——竭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王宫中有鸠摩罗多建的伽蓝。^①这个记载透露出童受到过古代新疆地区，他顺而到龟兹传法也完全是可能的。童受《喻鬘论》梵本残片在克孜尔石窟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喻鬘论》和“经量部”思想，在龟兹地区弘传的史实。

佛教石窟是通过直观视觉手段宣扬佛教思想，以譬喻的方式、通俗的故事、感人的形象等特殊功能引导信众通过形象思维去体味与感受佛教义理的真谛。但是，石窟艺术毕竟在全面而系统表现佛教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直接和完整地表达说一切有部全部哲学的深刻内涵。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试图从龟兹石窟图像中显现的有部基本思想，如“宇宙观”“因果观”“菩萨观”“佛陀观”“解脱观”等一些根本性问题入手，研究探索龟兹佛教基本思想的内涵与特征，作为龟兹佛教说一切有部整体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更多的课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

在确定理论定位时，“大乘佛教”和“密教”思想在龟兹石窟的表现与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都是龟兹石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石窟中反映的“大乘佛教”有两个部分、两个系统，两个时期。一是龟兹佛教早期时，由印度传入的“般若学”。主要以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为代表弘扬的大乘“中观”思想。一是唐代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府”期间，由中原迁移到龟兹的汉人信奉的中原“净土”思想体系。龟兹“密教”也是这种情况，有早期“杂密”的某些影响。有唐代和回鹘时期流行的比较成熟的密教。以上虽然同一派属，但理论上有一定的差异，研究时必须区别清楚。

以往研究龟兹佛教思想和龟兹石窟艺术内涵，虽然注意从与“小乘”关系密切的《阿含经》、各类“律典”和“本缘”经典寻求根据。但在研究过程中，仍有史料不够充分的感觉。对其他语种文献我们又无完全驾驭的能力。这也是龟兹佛教研究进展艰难的原因之一。当我们打开思路，转

^①《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987页。

变观念后,发现问题不是原来那样。其实,研究部派佛教和说一切有部是有非常丰富的汉译佛典资料的。早在东晋时已经形成了中国早期毗昙学经典体系。最重要的是,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带回当时流行的全部阿毗达磨论典,即《发智论》《六足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和《俱舍论》。玄奘回国后,很快将这些经典译成汉文。唐代初期毗昙学的经典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玄奘之后高僧义净赴印度求法,携回大量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他还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详细记录了当时印度部派佛教的状况、佛教寺院的生活、戒律仪轨等,是研究说一切有部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的十分重要的资料。义净回国后不久也将这些律典翻译出来。玄奘、义净二位法师将印度流行的说一切有部的几乎全部的经典、律典翻译出来。可以这样说,研究龟兹佛教义理思想和佛教戒律的文献并不匮乏,只是过去我们的视线不在这里。而且玄奘、义净翻译的有部经典、律典带有当时印度佛教的时代特征,也可以认为是研究龟兹佛教最“鲜活”的背景资料。另外,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和文献,及相关著作已经陆续译成汉文出版,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研究有非常大的作用。^①巴利文大多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的文献,与龟兹佛教思想非常接近。是研究龟兹佛教极为宝贵的资料。

尽管有上述各类佛教经典和文献,给我们研究龟兹佛教和石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分析,鉴别的可靠基础。但必须清楚认识到,汉文系统经典,在中国内地翻译成汉文时,大部分都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汉译佛经还不能百分之百印证龟兹石窟的内容。即使南传佛教的巴利文佛典,也都与龟兹本地佛教思想存在一定的距离和差异。目前发现的龟兹本地所谓的“胡本”资料,犹如凤毛麟角。已经发现的十分有限的龟兹吐火罗文资料,解读是否完全到位,还处于待检验的阶段。以往有学者在解释龟兹石窟图像内容时,常有用汉文经典对照后,即称是根据汉文某某经而绘的结论。这是不科学的、本末倒置的,易导致偏差的做法。因此,在使用非本地经典资料时,尽可能要做一番鉴别、梳理、比较、验证以及逻辑推理工作。

龟兹石窟图像题材内容研究,是龟兹石窟研究的重点,也是取得显著成果的部分。学者为了分类清楚、易于识别,将佛陀的事迹分为“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并将佛传中的重大“度化”事迹称为“因缘佛传”(亦称说法图),以区别菱形构图中的“因缘故事”。这种分类已“约定俗成”为学术界广泛使用。不可否认,在普及佛教艺术,通俗解释图像内容方面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从佛教历史与佛学研究角度看,这种分类就产生了诸多问题。主要是龟兹佛教的思想理念、理论特色混淆不清。许多所谓“本生故事”中其实蕴含着过去的“因缘”,“因缘故事”中的事迹,包含“过去佛”的故事。所谓“佛传”中佛陀的授记是前世的事情,而降生后到“降魔成道”实际上仍是行“菩萨道”的阶段。所以,为了探索清楚龟兹佛教的“因果观”“菩萨观”“佛陀观”“解脱观”等一些问题,必须以说一切有部的理念为路径,以“毗昙学”为导向,方能将龟兹图像的原有内涵捋顺厘清。

根据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理论,对佛陀的全部生涯,大体的历史分段是:

1. 菩萨修行阶段,即从释迦牟尼前世发誓修道,过去佛为其授记始,到降魔成道之间,均为行

^① 郭良鋆译:《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邓殿臣译:《长老偈长老尼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郭良鋆著:《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段晴译:《长部》,中西书局,2012年。

“菩萨道”阶段。阿毗达磨论师一般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三阿僧祇修行时代；百劫修行时期；投胎宫中至逾城出家；三十四心断结成道（降魔成道）。其中三阿僧祇修行时代与百劫修行时期称为“轮回时代的菩萨”，从兜率天投胎宫中至逾城出家与三十四心断结成道阶段称为“最后身菩萨”阶段。

2. 涅槃阶段，成道即是涅槃。《杂阿含经》说：“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佛成道后即进入了涅槃阶段，佛体寂灭前称为“有余涅槃”。佛陀寿命已尽，生身舍弃，进入了“无余涅槃”，才真正达到涅槃解脱的最后境界。有部的涅槃观是以“法体实有”为基础的，同时又承认涅槃有“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两种。按说一切有部的观点，释迦牟尼成道就是进入“有余涅槃”阶段，这个阶段突出佛“度化有情”的种种事迹。在龟兹石窟图像中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说法图”的内容。“无余涅槃”是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有部特别注重“无余涅槃”境界的渲染，《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对无余涅槃描述的最为深刻。围绕无余涅槃展开了很多的故事，以烘托无余涅槃的究竟意义。

龟兹石窟图像原来分类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内容，是可以从汉文的“本缘”类经典中对应出一大部分来。主要是从《六度集经》《贤愚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旧杂譬喻经》《杂譬喻经》等对应“本生”“因缘”故事及从《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佛本行集经》《众许摩诃帝经》《僧伽罗刹所集经》《佛本行赞》等对应“佛传”故事，对解读龟兹石窟图像内容，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述经典大多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形成的，基本属于“小乘”经典系统。此外还有在中原汇编的“类书”如《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等记录了不少其他典籍不载的资料。但是这些在中原形成的经典及“类书”，有的是重新编撰，有的翻译时参入了不少大乘思想，《六度集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六度集经》汇集了大量的佛生前的修菩萨道的事迹，但康僧会汇集翻译此经是以大乘“六度”观念组织翻译的，译文中揉进大乘思想。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也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重要历史资料，不可忽视。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把握用部派佛教思想观点来鉴别和解释这些经典所述的内容。本书就是立足于部派佛教思想的立场，用新的理念与视角来考察和分析龟兹石窟图像故事内容的。

从龟兹石窟图像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到一个观念——唯礼释迦。这是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最鲜明的思想特征，是识别龟兹石窟属性的重要标准。大乘佛教批判小乘佛陀观就集中在这一点上。《出三藏记集·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中对南朝僧人竺法度执意信奉小乘，不读大乘经典被批为：“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①《高僧传·昙摩耶舍传》中也有记载，称竺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②“唯礼释迦、无十方佛”正是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佛陀观”的核心。有部认为现世只有释迦牟尼佛，没有其他佛。但是主张过去有无数佛相递传承，法系久远，绵延不断。释迦牟尼行菩萨道时，供养过无数佛，佛经称为“逢事诸佛”，也就是“轮回时代菩萨”对过去佛的崇敬供养和接受授记的阶段。龟兹石窟图像对“过去佛”的描述，占很大的比重，是龟兹佛陀崇拜的一个显著特点。

① 《出三藏记集》卷五，中华书局，1995年，第232页。

② 《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第329页。

龟兹石窟供观像和礼佛的有图像的中心柱式窟和方形窟的结构,应该是按上述理念而设置的。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是“佛教宇宙和过去世”的部位,一般绘出“天相图”和释迦菩萨的修菩萨道(本生)事迹或过去佛(包括释迦牟尼佛)的种种因缘度化事迹。主室正壁是成道的佛主尊像及相关内容。主室前壁上方绘释迦菩萨兜率天作“补处菩萨”准备降生世间的情景。主室两壁绘释迦牟尼“有余涅槃”的重要说法度众事迹。后室则完全是与“无余涅槃”关联的事迹。方形窟布局略有不同,穹窿顶绘过去七佛、六佛和释迦菩萨侍奉供养。方形窟主室中央一般设佛坛,塑佛像。四壁绘“佛传”“说法图”或“戒律图”。方形窟涅槃一般绘在主室前壁上方。中心柱窟与方形窟布局不同,但“唯礼释迦”的思想是一致的。

龟兹佛教与龟兹石窟研究的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明确后,在吸收以前诸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龟兹石窟研究作了重新地审视,对我们以往的研究作了修正与补充。但必须指出,我们用新的视角、新的解读、新的方法,不可能解决龟兹石窟所有的问题。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有待破解和深入探讨,如龟兹佛教在世界佛教史的地位;龟兹佛教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与影响;从佛学角度分析龟兹石窟年代问题;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的交叉、衔接、转化以及对龟兹佛教的影响;龟兹石窟本身发展的特点;克孜尔石窟早于其他石窟衰落的原因以及大量图像内容的继续考证解读等。另一方面必须清楚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龟兹石窟已经是经过多次历史劫难而残破不堪、满目疮痍的躯体。不完整的遗存资料,为全面深入研究,带来不可名状的困难,所以这个命题研究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本书所展示的龟兹佛教和龟兹石窟的研究成果,仅仅是全部命题的“冰山一角”,只是探索的起始一步。